

起源和确立

日本

A HISTORY OF SINOLOGY IN JAPAN

壹

李庆著

WU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 HISTORY OF SINOLOGY IN JAPAN

日本汉学史

(第一部)

起源和确立

李 庆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学史 .1,起源和确立/李庆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国文化与世界)

ISBN 7-81080-076-0

I. 日… II. 李… III. 汉语-研究-日本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2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陆英英

印 刷: 江苏省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125 字数 50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076-0 / H · 038

定 价: 35.4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中国文化与世界》编辑委员会

主 编:何 寅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顾 问:乐黛云 吕必松 汤一介 贾植芳

编 委:王德春 朱威烈 汪义群 何 寅

李月松 陆楼法 张智圆 胡礼忠

耿龙明 谢天振 谭晶华

序

章培恒

进入 20 世纪以来,日本的汉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较为明显,有些则尚不甚为人所知。但如仔细查考,就不难发见踪迹。例如,20 世纪兴起的疑古思潮,常被视为中国学者的创见,但在仓石武四郎的《中国文学讲话》中有如下一则记载。

距今约 50 年前,我刚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时,担任一年级的“东洋史”课的是箭内互先生,这位先生在“东洋史”课的开头部分讲授道:尧、舜等帝王并不是实在的人物,而是后世造出来的故事。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年级中的中国留学生突然站起来,变色抗议道:“先生!尧、舜是有的!”

原来,说尧、舜、禹并非实有人物乃是白鸟库吉先生的创见。他说,由于在《尚书·尧典》中存在着关于尧的观测天文的记事,这意味着“天”;同样在《尚书》里,由于《禹贡》中禹对地理作了陈述,禹意味着“地”;而舜在《尧典》中由于修治人道而意味着“人”;总之,尧、舜、禹乃是将“天、地、人”的思想拟人化的产物;那也就是箭内先生等的少壮学者所支持的见解。然而,这种学说在当时的汉学者看来,可谓“实在不可思议”;从那以来,这一论争骚

动了学界达 20 年……(《中国文学讲话》第一篇《神话的世界》)

此书虽于 1968 年 11 月由岩波书店出版,但在这之前,已由《中国语》杂志连载,并连载了 26 回(见该书《前言》),故其第一篇当写于 1966 年,所谓“50 年前”,当为 1916 年。这就可见否定尧、舜、禹为实有人物的见解至迟在 1916 年前后就已深入到了日本的高级中学;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自也可以推知。而到了 20 年代,中国也产生了以《古史辨》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同样否定尧、舜、禹为历史上的实有人物。而且,在中国否定尧、舜、禹的顾颉刚先生是一位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的学者,据其女公子顾潮所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所载,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就始于顾颉刚先生。“剽窃”云云固为诬罔之辞,这是只要看一看《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在日本一再印行的事就可以明白的,日本学界绝不至昏愤或宽容到让一部“剽窃”他们同胞成果的书一直在他们国土上招摇过市;但从这一说法中也就可以知道顾颉刚先生当时是熟悉日文学术著作的——倘说他专看《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以供揭发鲁迅之用,对属于他本行的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却绝不浏览,似也太远于事理。因此,对于中国的这一疑古思潮的形成原因,实在是值得玩味的。

我之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到了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不能避免外国的影响;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所以,要理清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过程,也必须对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同类研究有相应的了解,否则便会发生种种错觉。可惜的是,现在还很少看到这一类著作。因而当我读了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的第一部后,真有不胜惊喜之感。

此书的第一部,所述虽是 20 世纪日本汉学的起源和确立,但却已洋洋四五十万字,使读者能对 20 世纪的日本汉学不同于其以

前的汉学的所在及其精神实质、来龙去脉具有清晰的理解,并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日本汉学的进展及其代表性人物的工作获得较具体的认识。材料固然极为丰富(例如上文提到过的白鸟库吉的尧、舜、禹否定论,此书就有很精当的介绍),更有很强的体系性和高超的识力。从第一部的情况来看,此书必将成为对 20 世纪的日本汉学发展的总结。

在读完第一部以后,我个人受益甚多。不但增加了许多有关的知识,并有不少重要的体会。举例来说,日本的汉学研究自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如本书所显示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实证研究的注重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对我们自己的治学就很有意义。

总之,基于这部书的卓著成就,可以预言,它必将具有悠长的学术生命。我能有机会为此书作序,实在深感欣幸。

前 言

明治维新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汉学的发展,是日本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进一步考虑的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分支。

笔者在此想对日本汉学的发展,作一些概括性的研究和论述。

(一)

黑格尔说:“要进行研究,首先就要明确研究的对象。”^①

然而,对我们这里说的“汉学”,世间的理解却是大有争议的。

首先,由这两个汉字构成的单词,在中文和日文中都存在。虽说内涵在很多地方是重合的,但是,也有相当程度不同。所以如果不加以辨析,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论争。

先看日语中的用法。日本最有代表性的辞典之一《广辞苑》(1974 年第 2 版)对“汉学”一词的日文含义是这样解释的:

1. 在日本一般对于有关中国的儒学以及中国学问的称谓。
2. 中国和宋明理学相对的汉唐训诂之学;清代惠栋、戴震等的考证之学。(485 页)

近年出版的《日本语大辞典》(讲谈社,1990 年)则是这样解释的:

1. 中国清代以客观的实证的训诂之学为中心的学问;经学。
2. 一般的中国的学问;以传统的所有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

并注明,与之相对应的词是“国学”、“洋学”(417页)。

我们所说的“汉学”不是《广辞苑》的第一义项和《日本语大辞典》的第二义项所说的那种狭义的汉学,而是和上述解释中广义的汉学相近的。说是“相近”,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一样。因为只要辨析一下上述两者的解释,就可以感到它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

“有关中国的儒学以及中国学问的称谓”,这里,“中国的儒学”和“中国学问”之间的内涵相差太大,中国的佛教、道教、医学、科技、美术等等,并不包括在儒学,或并不全部包括在儒学的体系之中,那么,它们算不算“汉学”研究的对象呢?

“一般的中国的学问;以传统的所有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这样的定义相对比较概括,但“以传统的所有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那么,对于现今中国的研究就不包括在内。比如,30年代前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调查;对鲁迅的研究,算不算“汉学”研究呢?而且,“传统”,这又是一个非常不明确而充满争论的概念。可见,要严格地对一门学科下定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即使不再详加分析,采用比较笼统的说法,最大限度地把汉学理解为“一般的有关中国的学问”,或就理解为,只是以“传统的所有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否就具有包容性呢?也并非如此。比如,在日文中,我们可以称江戸时代的荻生徂徕、伊藤仁斋、安井息轩等为“汉学者”,也许可以称明治以后的岛田重礼、林泰辅为汉学者,但是,同样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如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乃至津田左右吉、橘朴、羽田亨、山路爱山、远藤隆吉等等的学者,在日文中,我们能否称之为“汉学者”呢?恐怕是有不同看法的吧。因为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汉学”的概念,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不是从语言学的词汇定义的角度,而是从现实的近代日本对中国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汉学”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

日本学者在谈论汉学时,有时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岛田虔次

先生在谈到近代日本对中国思想研究的情况时,就把“汉学”规定为“支那哲学性”的,和“考证学性的”、“批判主义”的相区别。^②而酒井忠夫在“橘朴和道教研究”^③一文中说到:在从传统的考证学式的“汉学”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支那学”界,首先应当提出的是东京大学服部宇之吉博士的业绩。在考证学式的“汉学”上,加入通过现地体验的研究,确立了近代支那学的基础。也就是说,汉学不就是“支那学”。

总之,说到日文的“汉学”,与之相对的,不仅有“国学”、“洋学”这样的学派,还有着“东洋学”、“支那学”以及近年的“中国学”、“东方学”等不同的专门用语。它们在现实中都有着具体的内容,需要我们从现实的研究中去加以认识和理解。

再来看中文中“汉学”一词的含义。

《现代汉语字典》认为:“①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②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④

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关于“汉学”一词,收有三个义项,除了中国古代经学意义上的汉学以外,主要是引用了俞樾《茶香室丛钞》和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一书的用法,也就是把“汉学”理解作“sinology”的中文译文。(见6卷54页)

《辞源》由于是注重于中国古代词义解释的辞典,以“汉学”一词,只作“训释文字”之学的传统性解释。^⑤

要之,虽说中文中也有一些歧义,对“汉学”所指的内容相对比较明确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那么,古代的文化、历史和现代的文化、历史的区别就不存在了。实际上,对于现代的中国历史的研究等,是否属于“汉学”的研究范围,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看法的。

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周法高写过一篇“何谓汉学”的文章。

认为：

中国研究，这个名称太广泛，可以对有关中国方面的无所不包。例如，中国地质、中国植物的研究，通常属于地质学、植物学的范围，而不属于“汉学”的范围……还有一点，现在美国相当时髦的中国研究是中共问题。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称为是“中国问题专家”(China experts)……这种人和“汉学家”的性质也有点两样。所以我们依然不能拿“中国研究”来代替“汉学”的名称，更没有一个名称和“汉学家”相当。^⑥

我以为这仍是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此外，这个问题也曾涉及政治上的论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声称“汉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学问，进行全面的否定。对此，就不必再议论了。

综上所述可见，对“汉学”的定义，还是颇有异议的。

笔者认为，在此无法要别人完全地同意某一种定义。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所说的“汉学”，应该有比较明确的定义。我在此书中说的“汉学”，是指中文意义上的汉学，就是和世界上所谓“sinology”含义较为相近的“汉学”。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的日本近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学。为了区划明确，也可称为近代汉学。

我们这里说的“汉学”，不等于日本一般所说的“东洋学”。因为，“东洋学”中有些内容，比如对印度的研究，对朝鲜的研究等，不属于“汉学”的范围。

我们这里说的“汉学”，不等于日文中一般所说的“支那学”，因为“支那学”这一名称在日本近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上，有其时代的

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学术界不用此名。而且,从现实的研究成果来看,较多侧重于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侧重于文献的考究。有些“东洋学”的学者也不认为自己是“支那学”者。

我们这里说的“汉学”,不等于一般所说的“东方学”。东方学的说法,考其起源,出自欧洲的“orientalist”一词的译语。美国早在1842年就成立有“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成立“东方学会”,发刊《东方学》杂志,在日本的一些学者中渐渐流行。但就其研究的范围来说,也比较广,比如,其中包括对日本、印度文化等的研究,和我们所说的“汉学”不同。

我们这里说的“汉学”,也不等于一般所说的“中国学”。“中国学”的范围还是太广,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现实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乃至中国的所有方面,都是“中国学”的对象。而我在此介绍论述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有时则包括到近代)的研究。就时间的下限来说,大致到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

我们这里所说的“汉学”,就具体内容而言,包括了日本近代所谓的“汉学”、“东洋学”、“支那学”、近年的“东方学”中有关中国的研究部分以及“中国学”中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哲学思想、民俗宗教、语言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主要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于“汉学”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很难说就严密。概念只是现实的概括,现实的情况总比概念丰富、复杂。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做到这样的地步。

笔者把时间的下限,原则上断到1911年,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为止。这是因为,此后的许多研究,还需要经历时间的过滤和历史的检验,需要进一步的整理。还应再说明一下的是,笔者所研究的对象,也不是日本“汉学”的全部,这样的范围也还是太大了。这里研究的,只是日本“汉学”中,明治维新以来以20世纪近代汉学为主体的部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和

传统的相比,有着相对独特之处。

(二)

日本近代汉学的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有其来源和历史展开的必然性。笔者以为,它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

一、世界汉学的影响。在每一个时期,日本的汉学都和世界汉学界有着联系。最初是法国,接着是法国和德国。最后在战后一个时期,也多少有旧苏联的影响,但主要是美国。我们在每一个时期日本汉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理论和研究的角度)上,都可以看到国际汉学界的影响。本书中,笔者尽力在可能的地方,以实证的材料来说明这一点。

质言之,近代的日本汉学,是东西文化交汇的产物,是世界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和中国学术研究的联系。在 20 世纪的中日汉学界,有一种很微妙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课题上。在日本盛行的一些研究,经过一定的时期,或者就是在同时,也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比如,在思想领域中的“疑古派”,史学领域对甲骨文等新出史料的重视和研究,在文学领域中,对戏曲小说的研究,都可以看到这样互相刺激的情况。

这固然和两国学者的交流有关。但在深层,恐怕也存在着如下社会心理情况:

就中国的学者来说,认为中国文化是我们的“国粹”,别的国家有所研究,我们当然也不甘落后,也要去探讨一番。就总体上说,中国的学者有着相对的“天时、地理”的有利条件,在材料上也总有方便之处。所以一旦真的投入,就有取得较大突破的可能。反之,有的日本学者,在相当的时期内,自恃和西方的交流走在中国之前,有着得风气之先的优势;在研究的个人条件上来说,也比中国

的学者为佳,再加上在一部分学者的潜意识中,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有着轻视中国人的阴影,所以,在一些研究的课题上,也时有要在学术上“一见高低”的思想。

不管怎么说,两国的学术界,有着互相刺激和影响的关系,则是很显然的。中国本土的研究,是日本汉学的一个重要起源。离开了中国本土汉学的发展,离开了中国大量新出土的文物和对文献、文物的整理,近代的日本汉学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

三、日本自身学术传统的继承。明治以来,虽说日本“脱亚入欧”,但是,在汉学研究方面,原来江户时代的学术传统,原来的研究成果,仍然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承着。比如在研究的内容上,对阳明学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的考证和推理的手法,在资料上,对过去整理资料的利用等等,这些影响都在新的环境下表现出来。

而任何一种外来的要素,如果没有日本本身传统的支撑,要取得生命力,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20 世纪的日本汉学虽有自身的特点,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毕竟只是源远流长的日本汉学的一个阶段,日本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传统之外的东西。

近代的日本汉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近代日本汉学,就其展开的历程来看,有着这样一些发展的阶段:

1. 明治维新以后到 1894 年,这是经历了激荡的时代洗礼,融汇了东西文化,近代日本汉学得以萌生的时期。

2. 1894—1918 年,这是整个日本在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近代日本汉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3. 1919—1945 年,这是日本帝国吞并朝鲜后,进而侵略中国,最后发动针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后遭到彻底失败的时期,也是近代日本汉学的成熟和

陷入迷途的时期。

严格地说,这一时期还可以 1937 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但是后一阶段中,日本汉学的成果,相对有限——战争把一切都无情地抛到了历史的后台,而军国主义的“御用”研究和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特别显眼。从实际的写作考虑,我把这作为一个时期来处理。

4. 1945—1960 年,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整个社会发生巨大转折,在“民主主义”的社会环境下,日本汉学经过恢复开始再次走向世界。

5. 1960—1971 年,这是在国际冷战的架构下,日本汉学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起飞,在冷战风云中前进,并在国际汉学舞台显示自己的存在,取得新发展的时期。

6. 1972—1989 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恢复了邦交,在中日友好的新时期,日本汉学展现出新兴盛的时期。

7. 1989 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风波”,世界上东西冷战结构的终结,整个日本的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期的日本汉学,面临着 21 世纪的到来,发生很大变化。

笔者就是按照这样的阶段,对整个 20 世纪的日本汉学,进行勾勒和探讨。

根据笔者的研究,认为近代日本汉学有这样一些特点:

1. 纵观近代的日本汉学,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当的部分受到政治思潮的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汉学和政治有相当的联系,这是有目共睹的。大战之后,虽说不像原来那么密切,但在一些学者中,受政治气候影响的情况还是不少的。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时代区分”的论争,70 年代的“中国农民起义的研究”,90 年代的“中国专制主义”论说等等。就研究者本人来说,也许并不是有意识的,但是类似的研究题目本身,就是一定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这恐怕也是难以否定的吧。当然,也有不受或很少受影

响的领域和研究。

2. 日本的汉学研究,就其主流而言,非常注重资料。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语言能力的养成,讲究对原著的解读。真正有成就的日本汉学家,对汉文和中国文献的理解水平都非常高。这固然有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原因,而和他们个人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这是胜于欧美汉学家之处。不仅如此,不少学者还会除中文以外的另一种西方语言,这对他们了解世界汉学的发展动向,利用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大有益处。而这是不少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所不如的。二是有着注重利用日本所藏,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有资料来进行研究的特点。日本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量汉学资料,除公家图书馆、大学藏书、私人(法人)式的文库以外,还有大量寺院、个人的收藏,其他国家汉学界无法相比。三是对新发现的资料的热忱和关注,尤其是对出土考古的文物,学界反应之快,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很难望其项背。

3. 近代日本汉学,受西方汉学界观点左右的情况屡见不鲜。不少学者是用西方的观点,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切入。如最早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文化外来论”,后来的“水利史观”、“征服王朝论”、“世俗化理论”、“文化冲突论”等等,这些理论,当然应该作为研究的参考,也完全可以作为思考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对西方的“理论”只是以此为框架(是否真的理解暂且不论),把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资料“填入”,便算作“成果”,这是否应该再加考虑、引以为戒呢?

4. 近代日本汉学者,往往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充分收集资料,加以研究。在不少具体问题上,有着非常出色的成果。但也应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学者中国文化的修养、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感觉,渐渐淡漠。因而就表现为在一些领域,过于拘泥于个别的问题,而“见木不见林”。与此相关,有的则表现为对具体问题的出色研究和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树的倾向。

5. 对工具书和基础工作的重视。这不仅是日本汉学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日本汉学的传统。大量的目录、索引、辞典、影印资料,不仅为日本的汉学界提供了研究的利器,也为世界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这样的功绩,我想是所有中国文化的研究者,都应该对日本汉学界表示感谢的。

6. 近代的日本汉学,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区或者说区域特色。著名的所谓“东京”和“京都”派的区别,虽然有的日本学者不赞成,但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此外,九州、东北乃至北海道各地的汉学都有自身的特点。与此相关,则是各地的学派、团体和师承关系的存在。这些对于日本汉学的展开有很大的影响。

(三)

在此,谈谈关于此书写法的一些构想。

对于学术史的著述,记得梁启超曾提出过四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取舍;第二,叙某家学,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⑦

笔者认为,要研究日本的汉学史,首先对于在此以前我国的研究状况,应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笔者浅陋寡闻所见,在1945年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研究著述,主要有如下一些:

晚清时期:

何如璋:《使东述略》,见《小方壶斋丛书》,又见《走向世界丛书》。

张斯桂:《使东诗录》,见《小方壶斋丛书》四,1893年。

黄遵宪:《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版本甚多,不详列。)

王 韬:《扶桑游记》,见《走向世界丛书》。